

他是20世纪公认的经济学大师之一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  
他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他的思想和学说，也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盛洪、钱颖一、韦森……

# 科斯与中国

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

张曙光 盛洪 主编

COASE AND CHINA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013043841

F091.349

70

# 科斯与中国

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

张曙光 盛洪 主编

## COASE AND CHINA



北航

C1646772

091.349

70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13870610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 / 张曙光，盛洪编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086-3925-3

I. ①科… II. ①张… ②盛… III. ①科斯, R. H.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②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091.349 ②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64572 号

### 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

编 著：张曙光 盛 洪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92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925-3 / F·2881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张曙光

2010年12月29日，是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岁华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等十多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祝贺科斯教授生日，探讨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论，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本书就是这次研讨会成果的结集。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如果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算起，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产生和发展了75年，只是由于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故，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1986年，科斯教授的思想才介绍到中国。当时，由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需要，很快就出现了一股科斯热和制度经济学热。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科斯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科斯、诺斯、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格雷夫和张五常等人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内地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论文和著作问世，出现了像天则所这样以研究制度经济学为主的学术机构，还学习科斯的方法，组织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尽管曾经出现过一些曲折，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当作新自由主义来批判，国内的研究也曾经有过一段沉寂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反复和回潮，一系列重大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和丰富的材料。中国是一个大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古代文明，近代以来却落后了。改革开放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试验，但又发生了停滞和倒退，而中国制度变迁的成败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科斯教授也寄希望于中国和中国学者。

那么，怎样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呢？

首先，认真总结 30 多年来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看看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是失败的？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其中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我们从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大政府、强政府、富政府？再如，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从包、租、卖和破产退出开始，现在却大规模地扩张和强势进入，其垄断地位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资本化的，是如何从“为社会而生产”变成“为政府而赚钱”的？还有，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和怎样活动的，它们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总结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联系过去的 60 年、百多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实际，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

其次，直面我们的社会现实，看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哪些地方是合适的？哪些地方是扭曲的？是怎样扭曲的？如何校正和解决这些扭曲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至今，产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政策变量，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规则来保护自己的产权，而是通过进入体制内或者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来保护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赚钱，假药、假酒、有毒食品到处泛滥，已经大大地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一切难道仅仅是秩序形成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在机理是什么？不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

再次，透视人心，解剖灵魂，看看我们的各种社会和经济主体是如何行为的。为什么官场有腐败和黑暗，而人们又都想挤进官场，官员也是总嫌自己的乌纱帽太小，不少人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什么企业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比一个更恶劣，一些企业家只有违法乱纪、投靠行贿，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为什么学术界抄袭之风盛行，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很多学人突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为什么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甚至连亲情也遇到了危机？要知道，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失去精神家园的社会和民族是危险的。

最后，恰当地看待和正确地利用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资源。看看哪些是有用和有价值的精华，哪些是无用和无价值的糟粕，哪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共同价值，哪些有违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从而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以明确和端正我们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比如，中国是一个法制很不健全的社会，制定的法律、制度、规则、合约很难真正实施。如果说发达国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视制度的制定和建立，那么，我们就要把研究的重点从制度的建立推移到制度的实施，从合约的缔结推移到合约的治理。发达国家的产权明晰，不会发生侵犯农民地权之类的问题，而在目前的中国，这却司空见惯，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我们能不能不管 60 年来地权变迁的现实？通过私有化和国有化能否解决中国的土地和城市化问题？可否通过虚化所有权、做实用益物权，保证产权的有效实施？这涉及中国的传统和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总之，中国目前的情况迫切需要反思，需要批判，不是去盲目颂扬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认真检讨我们的失误。与此同时，要踏踏实实，既要学习和掌握国外理论的发展，又要深入中国的实际，到真实世界中去，长期观察，潜心思考，“用脚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旺盛的精力和正确的方法，在推进中国的制度变迁的同时，拓展制度经济学研究，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为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为什么科斯的名字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代《科斯与中国》序

盛 洪

2010年12月，为庆祝罗纳德·科斯教授的百年华诞，天则所联合十余家学术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了同名的纪念册。纪念册印刷出来以后，又配上专门制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响。不仅科斯教授收到后很是高兴，科斯太太爱不释手，很有鉴赏格调的张五常教授也倍加称赞，除会议赠送之外，还自己掏钱买了10套。他对这套纪念品只有一个批评，即在纪念册的最后，应该放一张现在中国的照片，以表示科斯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用自己的经济奇迹对科斯教授的报答。科斯与中国果真联系得这么紧密吗？

科斯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如同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的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如此的理所当然而又让人熟视无睹，以致成为“看不见的人”。

那么，重新强调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在于，这一自古

以来人们从不怀疑的制度在近代以来受到了忽略、质疑甚至否定。这不仅源于马克思的批判、凯恩斯的削弱，也源于新古典主义的漠视。这些理论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过分夸张人类理性的作用。产权制度就像所有的社会传统一样，在人类“致命的自负”的时代中，是无法昂首挺胸、自证合理的。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评判，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产权制度的否定才会大行其道。然而，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最终还要用事实去证实或证伪。在注重传统的时代，理论未必会被人们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时代，理论有可能成为一个集团的行动纲领，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理论有着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无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国成了否定产权制度的试验场。

科斯教授回顾说，他在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他移民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偏爱，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前者可能会引发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兴奋，后者则会带来社会现实中的战争、革命、掠夺、仇杀、饥饿、专政，以及改革带来的巨大成就。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试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试验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万倍的代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试验，又怎么证明理论是对还是错呢？只是不幸的是，这个试验场在中国。她不仅是我的祖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

科斯教授头脑中小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扰动，在中国现实中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导致了用暴力夺取在产权制度上较为成功的人的财产，并对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实行了肉体上的消灭。有大量史料记载，地主不仅被没收了土地，而且还不经任何合法的和公正的审判（哪怕依据否定产权的理论）而被剥夺了生命，准确地说，他们是被虐杀了。在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都变为“公有”以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不止三年），有数千万人被饿死。此后多年，



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中国不得不，当然也借助于开明领导人的出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科斯教授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就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么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 30 多年，中国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比什么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划经济，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诞生于 1910 年 12 月 29 日，第二年的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他成年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深重灾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冒险发现的神秘大陆。1987 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 50 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也许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很愿意结交中国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并对后者的才华非常欣赏。90 年代，我应他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后来认识科斯教授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现在的中国助手叫王宁。在 2008 年和 2010 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分别资助了两次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与中国人的直接沟通，使他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就这样，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内在的思想的中国，中国仿佛就是外在的现实的科斯。二者互相印证，交相辉映。科斯对中国的希望，就如同他对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样。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虽不因科斯的理论，而是缘于对中国传统的记忆和发掘，但科斯的理论与中国的取向不谋而合，并加强了这一取向。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 2008 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据说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只有中国人给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这足见科斯与中国的关系。随着科斯教授与中国的交往，两者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了。这本论文集，是作者们为庆祝科斯教授的百岁生日而提交给研讨会的，说明科斯教授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渐演化为中国自己的理论。反过来，中国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维素材。科斯教授在百岁生日回答王宁的采访时说：“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中国，理论和实践在互动，在融为一体。

当然，正如理论有争论也有谬误，实践也有起伏和反复。在中国，我们还面临着如何解释30多年经济奇迹的问题。一些人坚称，这是因为中国有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看不到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的领地不断扩大、产权不断清晰和个人化的过程。他们仍然以“中国特殊”为理由，试图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对中国奇迹原因的阐释和对当前问题的分析，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派发展的重要契机。科斯教授期待的这个“中国经济学派”就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经济学”。他对王宁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是一个个人，中国是一个社会生命体；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社会的生命理论上是无限的，只要这个社会遵循了正确的道路，如“正确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或者按照中国的说法，天道。而个人，因为社会“立言”，而使社会走上这条正确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将与社会一起不朽。

- 序一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张曙光 /V  
序二 为什么科斯的名字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盛 洪 /IX

## 第一部分 “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 一百年前,一个男孩诞生了 盛 洪 /3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4  
期待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纳德·科斯 /7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周其仁 /9  
市场和企业不是互替而是互补 张维迎 /15  
科斯影响力巨大的三个原因 钱颖一 /17  
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 肖 耿 /19  
经济学家为世界祭坛奉献脑力产品 许成钢 /21  
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 罗卫东 /25  
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27  
把案例研究引到经济学科是科斯的一大贡献 张曙光 /29  
经济学家应成为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反对者 李韦森 /31  
管理成本无限放大导致计划经济低效率 王小鲁 /34  
科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建华 /36  
科斯定理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获得广泛应用 黄凯南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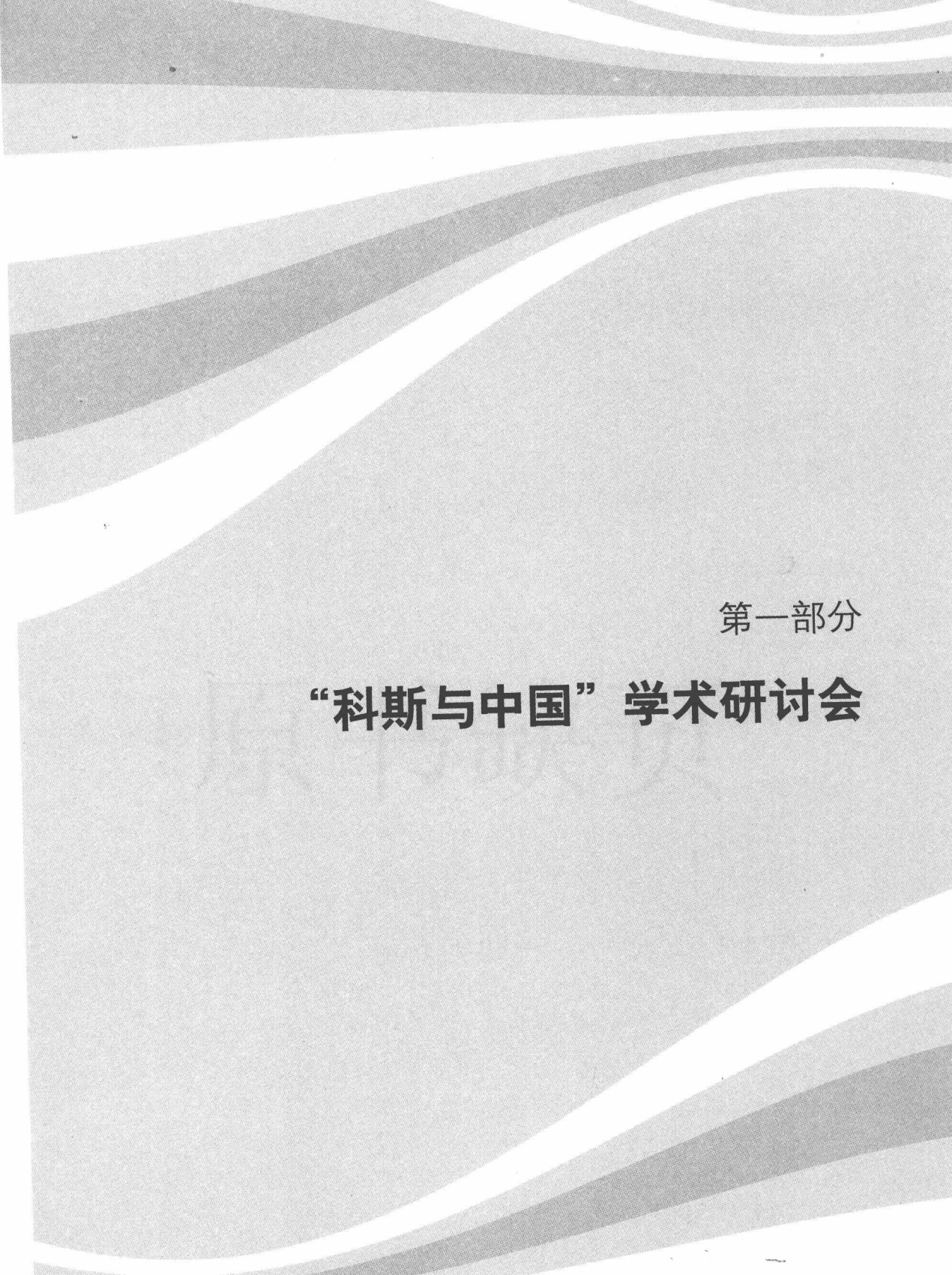
- 科斯的理论是让我们不断反省自身的经验 邓正来 /39
- 政府不能作长期承诺，科斯定理应用存困难 柯荣柱 /41
- 科斯理论尚不足以应对经济制度的变迁 李稻葵 /43
- 科斯对法律建树卓越 李建德 /45
- 在中国真正选择市场的是没有学问的人 毛寿龙 /47
- 经济学是有限的，解决经济问题还需其他知识 秋风 /49
- 百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定能面目一新 王宁 /50
- 私有财产所有者可以替政府解决很多问题 薛兆丰 /52
- 制度企业家对中国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姚洋 /54
-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科斯的最大安慰 张旭昆 /56
- 科斯理论对中国改革有很大指导意义 毛振华 /58
- 附录 “正确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派” 罗纳德·科斯 王宁 /60

## 第二部分 制度经济学

-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黄少安 /73
-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李建德 /82
- 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王珺 龚晓瑾 杨本建 /112
- 科斯定理与经济分析 谢作诗 袁晖光 /136
- 罗纳德·科斯的“思想市场论” 罗君丽 /154

## 第三部分 法与经济学

- 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科斯框架中法律界权的功能与成本 凌斌 /165
- 交易费用范式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初探 方斯远 /190
-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为什么没有失败？ 于忠江 /208
- 司法依附引起的产权交易问题研究 陈洲球 /221
- “人肉搜索”和隐私权边界的法经济学解读 徐珉川 /233
-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研究 张旭 王青 /246



第一部分

**“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 一百年前，一个男孩诞生了

盛 洪

这次会议是在三个不同地点同时召开的，芝加哥、北京和上海，我们跨了两个不同的时区。现在在芝加哥是12月28日下午19点，在北京和上海是12月29日上午9点。然而，我们这个会议有一个共同的时间，那就是在伦敦，现在是2010年12月29日凌晨1点。在伦敦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作威尔斯登，在那里，100年前，在1910年12月29日，一个男孩诞生了。后来，这个男孩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他在经济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革命，他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实践。他的名字叫罗纳德·哈里·科斯。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庆祝科斯教授的100岁华诞。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无法送给他一件比精神礼物更有价值的生日礼物，因为他是一个思想者。所以，我们举行了这场学术研讨会。

##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的百岁大寿，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个“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老人家祝寿。我因为姊姊刚在那时访上海，要陪伴另一个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参与。科斯百岁，没有我这个最年轻的老人家说几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过网络视频三地对话。

先进科技不灵光。事前试机几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个小时，不能再等，听不懂，看不清。硬着头皮胡乱地讲了20分钟。过了一天，美国时间又是科斯百岁正日，他的助手来邮说科斯很失望，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要求我通过视频对科斯再说一次。这次他听得清楚了。凭记忆再说，可能跟早一天说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断地要我说得慢一点。这次我分点说，较有系统，大略如下。

一、经济学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发展得特别好。其一是上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二是60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参与过这两个重要发展的人。此外，上世纪60年代是经济学发展最有看头的10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因此认为，100年来，在时间上最幸运的经济学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运程也不差。60年代专注地学习，价格理论师从鲍德温、赫舒拉发、阿尔钦；科学方法师从布鲁纳与卡尔纳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际遇。1967年到芝大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对戴维德的口述传统与科斯的论著很熟。当时弗里德曼专注于货币，施蒂格勒专注于工业结构，在研究题材上兴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讨是自然的取向。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也不问他谁对谁错。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样想：为什么30年代他会这样问，跟着又那样问；为什么他要



研究广播行业；为什么他认为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样想是我能深入地体会他的论著的原因。后来他对人说我是最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个思想家学习是学他怎样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肯定了自己经济学上要走的路。1967年，赫舒拉发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费雪；1968年，哈里·约翰逊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萨缪尔森；1969年的春天，科斯说我可能是另一个马歇尔。但我是张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儿。在芝大跟科斯研讨的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自己从佃农理论摸索出来的合约结构与选择得到他的屡次坚持。（科斯是个个性很强、观点顽固的人，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他不断地鼓励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是因为我斯密及马歇尔的传统很熟，只是加进交易费用及改进。）

五、思想上我也是个顽固的人。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气地走了40多年，没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释行为与体制运作，发展出来的是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重视概念的阐释与需求定律的运用。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远了，而解释及推断力之强西方的先进经济学者可能无法想象！10年前写下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今天大修会变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两卷，再两年可以完工。

六、回头说科斯的100年。那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时期，也最矛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天才之笔，反映着人类的智慧，但主义之争、政策与制度的采用，皆蠢得离奇。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发展中，中国竟然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30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没有想到会起飞得那么高那么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1980年12月，在底特律，他极力劝导我回到中国去，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1981年香港大学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亲80岁了，就依他吧。1982年回港任职，没想到，之前没有写过中文，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只是好于解释，为了一点关心我写了300万字。

八、2008年为科斯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要报昔日知遇之恩，用尽心机写，瘦了5磅。该文是写给科斯一个人读的，他满意，我开心，其他的人怎样赞赏或批评我无动于衷，一于懒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有意思的幻想。当